

“新常态”下的中巴贸易结构转型研究

钟 点

(北京外国语大学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系,北京 100089)

摘要:中国与巴西的双边贸易在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后,随着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放缓和巴西经济的低迷而陷入了停滞,持续高速发展了近 20 年的“互补型贸易”关系已不可续。中巴亟需调整思路,找到新的贸易突破点,实现结构转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两国应努力挖掘关键领域的合作潜力,实现外贸多样化和产业对接,使中巴关系真正成为“超越互补关系”的平衡、互利、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南南合作关系的典范。

关键词:新常态;中巴贸易结构转型;超越互补关系

中图分类号:F752.77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6-0051-06

一 繁荣却不对称的中巴贸易关系

中巴两国分别为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且巴西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巴西在中国的国际战略部署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全球化视野下,和平时期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普遍以经贸关系为基础和支撑,而中巴经贸关系也是中巴关系中最活跃、发展最迅猛且取得成果最丰富的“亮点”领域。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对巴西大宗商品及原材料进口需求旺盛,同时中国的多样化制造品及工业品大量出口巴西,中巴贸易在此格局下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双边贸易量翻了近 25 倍^[1]。自 2009 年起,中国已连续 6 年稳居巴西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在此阶段,中巴两国在贸易互补性的基础上均有获益,中国外交因此将其盛赞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构建双赢南南关系的典范。

然而,通过中巴贸易十年“黄金时期”(2001—2011)的发展,两国间形成了非常明显的不对称贸易结构。具体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出口商品结构差异较大。巴西对华出口的 80% 以上为国际定价的大宗物品,如 2014 年巴西对华出口 3 大产品(大豆、铁矿石和原油)占到对华出口总额

的 80%^[2]。这些初级产品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创造国内就业能力低且拉动经济总体增长的“多米诺效应”弱。与此同时,中国向巴西出口的 90% 的产品为附加值较高、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业制成品^[3]。

其次,出口产品集中度不一。巴西对华贸易产品种类较少,涉及生产部门类别较集中,且某些特定产品所占比例明显过重,如铁矿石贸易就长年占据巴西对华贸易总额的 50% 以上^[3];而中国出口巴西的产品种类繁多,涉及产业类别较多元化,且没有出现某种产品比重明显失衡的现象。

再次,双边贸易在总贸易量中占比不同。2013 年,对华贸易占巴西外贸总量为 17%^[1],而与巴西的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量之比则长年徘徊在 2% 左右^[4]。虽然导致这种差异的因素很复杂,这样比较不一定完全合理,但至少可以看出,巴西对华贸易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中国对巴西贸易的依赖程度。

贸易不对称向来是中巴贸易关系中较为敏感、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最主要的原因是两国的学者们对中巴间的贸易不对称现象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因而在两国间难以达成较为一致的立场。

在巴西,担忧和质疑的声音占据上风。巴西学术界

收稿日期:2015-06-10

作者简介:钟点(1990—),女,四川成都人,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巴西对外政策与中巴关系。

普遍认为两国间不对称的贸易关系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巴西经济的发展。如 CUNHA^[5] 和 MOTA^[6] 等认为 2003—2008 年中巴贸易在“大宗物品贸易繁荣”时期的迅猛发展只是两国经济利益的“周期性汇聚”,因此,“在互补性基础上发展中巴贸易关系”的主张是一种静态停滞的、还原主义的、本末倒置的观点;ACIOLY^[7]、CEPAL^[8] 等认为,中巴之间这种完全基于互补性的贸易模式会使巴西经济过度依赖对中国的初级产品出口,从而使巴西经济的外部脆弱性和风险性加大;CUNHA^[9]、OLIVEIRA^[10]、BARBOSA^[11]、LEDERMAN^[12] 等则进一步指出,来自中国的工业品对产业结构较为成熟的拉美国家、特别是巴西带来较大冲击,给一些刚起步的新兴工业带来沉重打击,且可能长期导致巴西整个产业结构朝着“再初级化”、“提前去工业化”的方向倒退,因而不利于巴西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与此相反,中国的学者们则对中巴贸易关系的不对称现象普遍持有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该问题并不会阻碍中巴贸易的长足发展。如李仁方^[13] 从国际分工和贸易比较优势的角度阐述了中巴贸易这一结构的经济学合法性,认为贸易不平衡仅仅是两国贸易互补性的恰当反映,并进一步认为巴西应遵循其资源禀赋优势原则,重点发展其资源密集型产业,以促进中巴贸易在当前格局下继续发展;魏浩^[14]、吕宏芬和俞涔^[15]、马玉霞^[16] 等则从两国资源禀赋特点的角度出发,通过中国与巴西的出口产品相似度、双边贸易结合度、产业内贸易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以及竞争互补指数等多个指标来分析两国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得出了中巴缺乏产业内贸易机会、应继续促进“互补型”产业间贸易发展的结论。

我们认为,在 2001—2011 年的中巴贸易“黄金十年”中,贸易不对称问题的确是中巴贸易关系发展最主要的掣肘之一。这是因为,贸易不对称问题触碰到了巴西国内重要生产部门的核心利益,而这些感到“受威胁”的国内政治力量则通过“政策制定”及“民意”传导机制,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巴西政府出台各种妨碍双边贸易的政策,从而不利于中巴贸易整体关系的健康发展。

中巴贸易不对称问题已经在巴西某些地区及个别经济部门引起国内政治压力。第一,个别部门受中国制成品进口竞争压力巨大,导致国内保护主义情绪高涨、贸易争端时有发生;第二,中国进口商品强势替代本土商品,导致巴西中小型工厂破产,城市人口失业问题加剧,地方政府人口调控压力增大;第三,中国进口商品的“井喷式”增长给巴西部分州市(如圣保罗州、亚马逊州和圣卡塔琳娜州)的地方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一些代表巴西国内“受威胁”部门利益的政治个人依靠自己的政治权利或影响力,通过“政策制定”(policy-making)的方式影响巴西对华政策内容。首先,在巴西国会立法两院中,很多参议员和众议员本身就是参与上述部门生产的企业家或在上述部门的经济组织内部供职。他们身为这些部门的利益“代理人”,通过投票支持或否决相关提案的方式,维护其部门利益;其次,一些上述部门的代表在巴西国会及各部委进行“寻租”(rent-seeking)活动,通过各种商业博弈和政治影响渠道,使本部门利益得到较大程度的保障。另一方面,一些代表巴西国内“受威胁”部门的利益的社会组织,通过“民意”(public opinion)渠道向当局施压,要求政府颁布有利于其部门利益但有损于整体中巴贸易的政策。首先,工会组织通过游行、罢工的方式向当地政府施压。例如,2013 年 10 月,巴西国家纺织、服装、皮革及制鞋工业劳工联盟,巴西纺织与手工工业协会,国家纺织业公会,国家服装业工会等,在圣保罗组成“反华”战线,公开游行抵制中国商品;其次,巴西各州工业联合会通过其下属的企业、学术机构、媒体等对外贸政策制定部门施压,其中实力较强的圣保罗工业联合会近年来不断要求政府对中国商品提高进口关税、设立贸易门槛;最后,巴西最大的、全国性的工业利益游说集团——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通过巴西国内政治协商渠道,直接要求巴西外贸委员会出台相关保护政策,例如该组织表示将于 2015 年 10 月联合各行业协会集体向政府施压,阻止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针对以上情况,一方面,我们可以加强与巴西各州、市级政府及相关社会群团组织的对话,增进了解和理解;同时据理力争,加强舆论引导,向巴西的执政者和普通民众展示中国商品有助于巴西经济发展的积极面(如在长期内有助于提高巴西国内经济效率和本地产品竞争力、降低人民生活成本、减少通货膨胀压力等),并在政治层面上给予巴西中央政府以信心和支持,使其能够顶住少数国内利益群体的压力,继续扩大和加深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以短期代价换长期利益,为广大巴西人民谋福利。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巴贸易不对称问题如果得不到足够重视和及时的妥善解决,最终会反过来影响中国自身的外贸出口和整体经济的发展,甚至损害到中巴之间整体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巴贸易结构进行适度调整,逐步实现从单纯的“互补型”贸易向高水平的“超越互补关系型”贸易的转型。

二 “新常态”对中巴贸易关系提出的挑战

在“新常态”下,中巴开展互补型贸易的有利经济条

件面临枯竭。与此同时,贸易不对称问题不仅不会自动消失,而且会随着经济下行的压力而逐渐尖锐化,甚至导致中巴贸易关系陷入紧张。“新常态”进一步凸现了中巴贸易结构转型的紧迫性。

自2012年初,由于固定净资本投入和出口的增速下降,2012至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保持在7.5%^[17]左右,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与此同时,拉美各经济体也先后陷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衰退中。巴西是在大宗商品繁荣周期受益较大,同时也是受中国经济放缓影响较为严重的拉美国家之一。受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大幅下滑的影响,巴西对华贸易余额逐年缩小(其中2014年第四季度巴西对华贸易出现33.47亿美元的赤字,2015年第一季度巴西对华贸易继续出现逆差),其经济也从2011年起陷入了增长乏力的困局:2014年增长率仅为0.14%,为五年内最差;2015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甚至出现了0.2%与1.9%的负增长^[18]。

中巴互补型贸易的繁荣与该时期中国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因而是有条件的、静态的和缺乏可持续性的。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改革进程将对“大宗商品—制成品”的互补型贸易模式造成冲击,原有的中巴贸易结构已不可续,必须改变。

第一,中国对巴西大宗商品的需求随着中国国内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而趋冷。2001—2011年间相对刚性的需求自2012年起发生改变,中国基础建设、不动产、钢铁、汽车制造等行业普遍出现产能过剩,中国对巴西铁矿石、原油等大宗商品的需求走低,其贸易量和贸易额同时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按照当前的趋势,两国很可能在2015年出现顺/逆差地位的反转。为了避免贸易赤字给已经深陷泥潭的巴西经济造成更重的负担,巴西政府势必会出台某些限制措施以减少从中国的进口。这不仅将严重限制两国双边贸易发展,甚至可能使两国贸易关系陷入紧张。因此,建立在“中国需求”基础上的“互补性贸易”模式濒临危机,两国急需找到更具活力和有更强的可持续性的贸易领域。

第二,中国经济膨胀周期已经结束,中国政府的施政重点不可避免地转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再平衡”。该政策旨在促进家庭消费,减小经济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实现可持续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中国经济若希望在可观的增长率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再平衡,其家庭消费需要提高28%,投资需要减少26%,而进口和出口则分别需要减少3%和5%^[19]。因此,未来几年,中国对巴西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也会面临下行压力。实际上,近几年的数据已经印证了这个推断:2014年,中

国向巴西出口额同比增加仅0.1%,为2010年来最低;2015年第一季度甚至出现4%的负增长^[20]。

由此可见,中巴贸易结构的转型不仅是巴西国内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强烈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那么,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中巴贸易关系应当如何迎接互补性下降的挑战?中巴贸易关系又如何结束“贸易不对称”,走向更成熟、更平衡、可持续的“新型南南贸易关系”?

三 打开关键领域合作,建立“超越互补关系”

在“新常态”下,巴西有减少对初级产品出口依赖、增强经济应对风险能力的需求,中国也有减少廉价制造品出口以平衡发展模式的必要。在中巴贸易结构的转型中,打开关键领域的经济合作是一个切实有力又极具潜能的抓手,理应成为一个重点和亮点。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国内改革的重点包括提高居民消费、促进制造业从低价值高能耗向智能化节能化过渡、完成金融体制改革等,而巴西在上述几方面都可能为中国提供关键的支持。我们将从竞争力、必要性和可行性等角度重点考察两国具有巨大合作潜力的三个关键领域:农业技术与开发(P&D)、混合动力汽车制造以及金融/银行管理软件技术开发。

(一)巴西在农业技术与开发领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与中国合作的可行性

巴西是当今世界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主要领导者,是继美国之后第二大植物生物技术生产国,在育种选种、土壤施肥、预防虫害、扩大产量等农业技术领域具有国际领先水平,且在近十年内通过其独特的农业创新模式,成为了发展中国家中少有的自然知识经济强国。巴西最大的农业科研及农业技术服务机构是巴西农牧研究院(Embrapa)。该研究院隶属于巴西农业、食品供应和土地改革部,兼具政府机构与现代企业的特点,是巴西乃至世界上最具实力的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之一。该院的科研实力强大,研究成果世界瞩目。2011年,开发出一种用于棉花的有机杀虫剂,能在有效控制清除棉铃象虫的同时不对土壤造成化学污染;2013年,研发出URSBRSHada柑桔杂交品种,兼具晚熟、柑桔溃疡病抗性且高产等优点;同年,与巴斯夫公司合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将转基因大豆推向市场。由此可见,巴西在农业技术与开发领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

与巴西在这些领域开展合作,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作为粮食消耗大国,中国受可耕地面积较少、土壤肥沃程度较低的限制,粮食尚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引进巴西农牧研究院的相关技术,可以提升我国的粮农生产水平和产量,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降低居民

生活成本并促进居民消费;其次,以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代表的中国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可以与巴西相关机构展开经验分享、人才交流和科研合作,提升我国农业自主科研水平,为市场注入更多绿色健康、营养丰富的优质粮农产品;再者,目前中巴农业贸易虽规模较大,但基本仅限于产业间贸易。如果能以农业技术交流为契机,实现两国农业生产链的对接和市场结构的匹配,那么农业将成为两国扩大产业内贸易规模、实现双边贸易平衡发展的重要引擎。

中巴在农业技术开发领域的合作已经启程。2009年5月,两国科技部签署《科学技术与创新合作工作计划》,将农业科学、农业能源、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确定为未来5年的优先合作领域。2011年,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巴西农牧研究院共同成立的中国—巴西农业科学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但遗憾的是,两国签署的很多协议仍停留在纸面,相关技术成果的本地化与产业化的深度和速度仍然不够。因此,双方应该开拓多样化的合作渠道,放宽政策限制,鼓励企业间的直接商业行为(如直接投资和技术性服务的直接进出口),并尽快促进两国农业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及质量评定标准的协调统一,为相关技术及商品的市场化提供便利,早日将农业技术合作成果大规模转化为两国国民的真正福利。

(二)中国和巴西在混合动力汽车制造领域具有广阔贸易前景和深远的合作意义

中巴在混合动力汽车制造领域的联合,不仅能为两国双边贸易注入新的活力,甚至可能给世界汽车产业带来重要变革。

中国已于201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但国产汽车一直饱受创新、设计、质量、品牌和相关现代服务水平之累,在开拓海外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的战役中频频受阻。而巴西汽车产业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具备一项独特的优势:巴西是世界乙醇燃料产业发展成熟度最高的国家。由于其生物燃料产业与汽车产业有紧密的市场联系,其乙醇燃料产业的竞争力发展模式在世界各国中最为合理高效^{[21]25-31}。巴西不仅拥有世界一流的生物燃料技术,且已经成功与欧洲发达国家汽车品牌合作,大规模生产销售乙醇/汽油混合动力汽车(carro flex)。如果两国能在此基础上加深汽车制造产业内合作,共同开发出具有完美的硬件设施及强大的软件支持的混合动力汽车,对于巴西的乙醇燃料出口和中国汽车制造“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生物替代燃料一直以来是中巴扩大贸易多样性的

热点之一,《中国日程》^⑨也将其定位为“未来中巴贸易增长极”和“优先出口商品”,然而两国在该领域的贸易却始终没有迎来实质性的突破。造成这种停滞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巴西单方面出口乙醇燃料及相关技术的意愿与中国国内替代燃料驱动汽车的市场接受度之间仍有距离。如果中国的消费者需要花高价进口欧美制造的混合动力汽车,再从巴西进口乙醇燃料,那么,这即使符合政府节能减排的目标,也不符合消费者成本/收益关系的理性考虑。然而,一旦能把巴西的生物燃料技术与中国的汽车硬件制造工艺结合起来,中国汽车制造企业就能借助巴西多年的混合动力汽车生产经验,一举突破多燃料发动机制造的核心技术难关,开发出具有市场前景的新型混合动力汽车产品。那么,两国就不仅能打通该领域的双边贸易通道,而且还能打破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的垄断,实现真正的双赢。如果两国能够合作建立起既环保又具有价格竞争力的绿色汽车品牌,这对于两国的未来经济发展和全球汽车产业升级都将是一次质的飞跃。一方面,在中国本土,混合动力汽车的市场化势必降低中国对石油进口的过度依赖,促进中国能源结构优化,大大缓解城市污染问题;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联合开发、生产混合动力汽车也会将“中国制造”和“巴西技术”推上新的台阶。

目前,中国汽车制造企业在海外市场运作所遵循的最主要商业逻辑是“价格营销”,即以其出众的性价比优势与其他国际汽车品牌“硬碰硬”,争取扩大自己产品在对象国的市场份额。然而,如果中巴能在混合动力汽车方面开展合作,将为中国制造的汽车超越“价廉物美”的定位提供一种可能,并为中国汽车企业开辟出一条更为广阔的发展之路。为此,中国已经进军巴西的汽车企业(如奇瑞汽车、吉利汽车、福田汽车等),可以与巴西混合动力引擎制造企业及乙醇燃料生产企业成立联合研发中心,以企业间直接技术转移或成立合资公司、建立联合品牌的方式,推进中巴混合动力汽车生产的资金融合、技术对接、生产分工与管理统筹,早日将世界上第一台完全由发展中国家自主研制的混合动力汽车推向市场。

(三)巴西金融/银行管理软件技术可以为我国金融/银行业的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提供重要支持

巴西在金融/银行管理软件开发领域具有国际领先水平,也是当今世界主要的金融/银行管理软件国之一,这与其金融体系变迁史有着深刻联系。20世纪80年代,巴西经济在巨额外债负担的重压下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货膨胀(1988年和1989年,巴西通货膨胀率分

别高达 1037.6% 和 1782.9%^[22]。在此期间,政府共更换了 5 种货币,以解决人们在物价猛烈变动中失去币值概念的问题,并实行了包括金融指数化、物价冻结、工资冻结在内的各种正统和非正统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22]。在通货膨胀率接近疯狂的时期,银行甚至需要对物价和工资做出极为细致的每日调整,这对当时巴西银行系统无疑是巨大的挑战。终于,1994 年颁布的“雷亚尔计划”结束了巴西的通货膨胀噩梦,而历经考验的巴西银行业也逐步完成了数字化和自动化,发展出了一整套以尖端科技为支撑的银行及金融管理软件系统,并成为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金融/银行软件出口国。

早在 2004 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时,两国政府就已看到在该领域的合作潜力,签署了银行自动化、税收智能化、“电子政府”、企业管理软件及物流控制软件等技术转让协议。2013 年,两国政府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这是中国推进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战略的重要举措。如今,在中国寻求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和资本账户、全面推进银行业改革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时期,如何实现银行与金融管理现代化及高效化是一项基本而迫切的任务。

我们认为,中巴在该领域的合作具有非常多的可行

渠道。中国可以通过与巴西共同参与的金融机制,如“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以及各自主要金融机构在对方设立的营业网点(如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驻巴西分行以及巴西银行驻上海分行等),逐步完成软件的先期试用、本地化改善、功能测评和广泛应用,较为平稳地完成金融/银行软件引进的本地化和规模化。这种合作方式的好处是:中国政府得以较为有效地控制中国金融/银行改革的进程,牢牢地把改革进度和深度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在不依赖西方金融/银行管理技术的前提下,我们也能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有效防范境外势力可能发动的金融攻击,从而逐步、平稳、安全地实现国内金融改革。

除了以上三个领域,中巴两国还在基础建设、能源开发和多元化服务业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巴双方必须尽快意识到过去“互补性贸易”的局限性,积极打通各领域点对点合作的渠道,找到两国贸易新的增长点。我们相信,凭借着两国政府的智慧和两国企业的努力,中巴贸易关系一定能够继续乘风破浪,一举破除过去“贸易不对称”结构的桎梏,踏入“超越互补”的新时代。

注释:

①2007 年,巴西发展、工业与外贸部,外交部与农业部联合制定并发布了确定巴西未来对华政策方向的指示性文件“中国日程”(Agenda China)。该文件旨在扩大巴西对华出口多样性,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寻找更高质量的合作机会。

参考文献:

- [1]巴西发展、工业与外贸部在线查询数据库[DB/OL].<http://aliceweb.mdic.gov.br//consulta-ncm/consultar>.
- [2]中国—巴西企业家委员会网站在线统计数据库[DB/OL].<http://www.cebc.org.br/pt-br/dados-e-estatisticas/comercio-bilateral/pauta-de-exportacoes>.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EB/OL].<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index110209.asp>.
- [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DB/OL].<http://data.mofcom.gov.cn/channel/includes/list.shtml?channel=mysj&visit=D&type=4>.
- [5]CUNHA A M, BICHARA J S, MONSUETO S E, LÉLIS M T C. Impactos da Ascensão da China sobre a Economia Brasileira: Comércio e Convergência Cíclica[J]. *Revista de Economia Contem porânea*, 2011, (15):406-440.
- [6]MOTA R. Brasil e China: Muito além fa Complementaridade[C]// *Brasil e China no Reordenamento das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Desafios e Oportunidades*. Ith ed. Brasília: Fundação Alexandre de Gusmão, 2011.
- [7]ACIOLY L, CINTRA M, PINTO E. As Relações Bilaterais Brasil-China: A Ascensão da China no Sistema Mundial e os Desafios Para O Brasil [EB/OL]. http://www.ipea.gov.br/portal/images/stories/PDFs/comunicado/110408_comunicadoipea85.pdf.
- [8]CEPAL. First Forum of China and the Community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 (CELAC):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on trade and investment[R]. Santiago (Chile):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Caribe, 2015.
- [9]CUNHA A. et al. O Brasil diante da Ascensão Chinesa: os Riscos da Especialização Regressiva [J]. *Austral: Revista Brasileira de Estratégia e Relações*, 2012, (4):135-175.

- [10] OLIVEIRA H A. Brasil e China: Uma Nova Aliança Não Escrita? [J].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2010, (53): 88-106.
- [11] BARBOSA A. China e América Latina na Nova Divisão Internacional do Trabalho [C]//ACIOLY L, LEÃO R P F, PINTO E C. *A China na Nova Configuração Global: Impactos Políticos e Econômicos* [C]. 1 th ed. Brasília: Ipea, 2011.
- [12] LEDERMAN D, OLARREAGA M, PERRY G. China's and India's Challenge to Latin American [R].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8.
- [13] 李仁方. 中国与巴西贸易结构新解: 中国的视角 [J]. 拉丁美洲研究, 2014, 36(3): 40-48.
- [14] 魏浩. 中国和巴西双边贸易的比较优势与互补性: 1992—2006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9, (7): 66-73.
- [15] 吕宏芬, 俞滢. 中国与巴西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2, (2): 56-64.
- [16] 马玉霞. 中国与巴西贸易竞争互补性分析——基于 CCI 指数 [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10 (10): 37-38.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EB/OL] <http://data.mofcom.gov.cn/channel/zhsj/zhsj.shtml>.
- [18] 巴西央行网站 [EB/OL] <http://www.bcb.gov.br/pec/Indeco/Port/ie1-51.xls>.
- [19] BANCO MUNDIAL. Implicações de uma China em Transformação: Oportunidades para o Brasil? [R]. Washington: Banco Mundial, 2014.
- [20] 中国—巴西企业家委员会网站在线统计数据库 [DB/OL] <http://www.cebc.org.br/pt-br/dados-e-estatisticas/comercio-bilateral/balanca-comercial>.
- [21] 翁天杭. 燃料乙醇产业竞争力的国际比较及发展前景预测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3: 25-31.
- [22] 张宝宇. 巴西的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经验 [J]. 拉丁美洲研究, 1995, (3): 8-14.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Brazil Trade in the “New Normal”

ZHONG Dian

(Faculty of Spanish and Portugues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have experienced a boom in the past ten years, however, as Chinese economy has entered the structural slowdown and as Brazilian economy has suffered a serious downturn, they seem to be caught in a stagnation. After nearly two decades of rapid growth, the “complementary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are no longer sustainable, and a new breakthrough has to be found. Therefore, China and Brazil should adjust their perspectives to achieve a successfu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bilateral trade. Under the “new normal”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tap the cooperation potential in key areas, aiming the trade diversification and industrial docking, so that a more balanced,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beyond the complementarily” can be built, which serves as a new exemplary model of South-South relationship.

Key words: the new norm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Brazil trade; relationship beyond the complementarily

[责任编辑: 钟秋波]